



民商事诉讼实务前沿

2025年2月刊

上海市律师协会
民商事诉讼业务研究委员会
编委会

王正 关峰 彭筱剑 施磊
莘欣 周郁婕 裔沁玮 肖文婷
薛娟 谭勇 叶枫 顾巍巍
赵国庆 王屹东 白翔飞 金艳韬
王彦 沙兆华 周云涛 沈悦

目 录

• 新规速递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3
- 国务院关于规范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的规定..... 8

• 业务动态

- 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纠纷的管辖确定.....11
-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首批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典型案例..... 15
- 入库参考案例解读：股东能否以其对公司的债权与出资义务进行抵销..... 25

• 实务研究

- 《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逐条解读与制度创新..... 28
- 裁判公司纠纷案件的基本理念 | 类案裁判方法.....36

最高法发布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

来源：上海市司法局

发布时间：2025-01-15 实施日期：2025-02-01

信息网络原址：<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52771.html>

法释〔2025〕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

为正确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当事人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请求确认重婚的婚姻无效，提起诉讼时合法婚姻当事人已经离婚或者配偶已经死亡，被告以此为由抗辩后一婚姻自以上情形发生时转为有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条 夫妻登记离婚后，一方以双方意思表示虚假为由请求确认离婚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条 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权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或者第五百三十九条规定撤销相关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

第四条 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案件中，对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各自所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各自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以及单独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归各自所有；

（二）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或者共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以及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以各自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情况、有无共同子女、对财产的贡献大小等因素进行分割。

第五条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时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登记，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给予方有证据证明另一方存在欺诈、胁迫、严重侵害给予方或者其近亲属合法权益、对给予方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等情形，请求撤销前两款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六条 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和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的“挥霍”。另一方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七条 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处理。

夫妻一方存在前款规定情形，另一方以该方存在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六条规定请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请求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少分或者不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八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相应出资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以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判决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并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合理补偿。

第九条 夫妻一方转让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另一方以未经其同意侵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转让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除外。

第十条 夫妻以共同财产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均登记为股东，双方对相应股权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离婚时，一方请求按照股东名册或者公司章程记载的各自出资额确定股权分割比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当事人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请求，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处理。

第十一条 夫妻一方以另一方可继承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放弃继承侵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主张另一方放弃继承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放弃继承导致放弃一方不能履行法定扶养义务的除外。

第十二条 父母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规定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一方以另一方存在赌博、吸毒、家庭暴力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形，主张其抢夺、藏匿行为有合理事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依法通过撤销监护人资格、中止探望或者变更抚养关系等途径解决。当事人对其上述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相关请求的，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夫妻分居期间，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致使另一方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另一方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关于离婚后子女抚养的有关规定，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并明确暂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一方有协助另一方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

第十四条 离婚诉讼中，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

- （一）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 （二）有赌博、吸毒等恶习；
- （三）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情形；
- （四）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且另一方不存在本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形；
- （五）其他不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

第十五条 父母双方以法定代理人身份处分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并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屋后，又以违反民法典第三十五条规定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为由向相对人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十六条 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显著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要、另一方的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

前款但书规定情形下，另一方以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无抚养能力为由请求变更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未按照离婚协议约定或者以其他方式作出的承诺给付抚养费，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其支付欠付的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前款规定情形下，如果子女已经成年并能够独立生活，直接抚养子女一方请求另一方支付欠付的费用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第十八条 对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中继子女受继父或者继母抚养教育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以共同生活时间长短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期间继父母是否实际进行生活照料、是否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是否承担抚养费等因素予以认定。

第十九条 生父与继母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后，当事人主张继父或者继母和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再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继父或者继母与继子女存在依法成立的收养关系或者继子女仍与继父或者继母共同生活的除外。

继父母子女关系解除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继父或者继母请求曾受其抚养教育的成年继子女给付生活费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抚养教育情况、成年继子女负担能力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但是继父或者继母曾存在虐待、遗弃继子女等情况的除外。

第二十条 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另一方同意的除外。

一方不履行前款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另一方请求其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子女可以就本条第一款中的相关财产直接主张权利，一方不履行离婚协议约定的义务，子女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由该方承担继续履行或者因无法履行而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有证据证明签订离婚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同时请求分割该部分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处理。

第二十一条 离婚诉讼中，夫妻一方有证据证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请求另一方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负担相应义务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对双方的影响以及给付方负担能力、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确定补偿数额。

第二十二条 离婚诉讼中，一方存在年老、残疾、重病等生活困难情形，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条规定请求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给予适当帮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请求，结合另一方财产状况，依法予以支持。

第二十三条 本解释自2025年2月1日起施行。

国务院关于规范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的规定

来源：国务院

发布时间：2025-01-10 实施日期：2025-02-15

信息网络原址：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501/content_6998736.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798号

国务院关于规范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的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行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机构（以下统称中介机构）为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收取费用等相关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应当遵循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独立客观的原则，同时配备具有相应专业能力和资质的从业人员，建立有效的利益冲突审查等风险控制制度。

第四条 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不得有配合公司实施财务造假、欺诈发行、违规信息披露等违法违规行为，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五条 中介机构应当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工作量、所需资源投入等因素合理确定收费标准，并与发行人在合同中约定收费安排。

第六条 证券公司从事保荐业务，可以按照工作进度分阶段收取服务费用，但是收费与否以及收费多少不得以股票公开发行上市结果作为条件。

证券公司从事承销业务，应当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综合评估项目成本等因素收取服务费用，不得按照发行规模递增收费比例。

第七条 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审计业务，可以按照工作进度分阶段收取服务费用，但是收费与否以及收费多少不得以审计结果或者股票公开发行上市结果作为条件。

第八条 律师事务所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应当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收费，并符合国务院司法行政等部门关于律师服务收费的相关规定。

第九条 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 （一）在合同约定之外收取费用，或者以临时加价等方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
- （二）通过签订补充协议、另行约定等方式规避监管收取服务费用，或者违反规定在不同业务之间调节收取服务费用；
- （三）违反规定入股，或者通过获取股票公开发行上市奖励费等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
- （四）其他违反国家规定的收费或者变相收费行为。

第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不得以股票公开发行上市结果为条件，给予发行人或者中介机构奖励。

第十一条 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时，应当在所报送的招股说明书或者其他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详细列明各类中介服务收费标准、金额以及发行人付费安排等信息。

第十二条 证券监督管理、财政、司法行政等部门应当加强信息沟通和协调配合，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对中介机构执业行为加强监管；必要时可以采取联合现场检查等措施，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三条 中介机构违反本规定的，由证券监督管理、财政、司法行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中介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的，由证券监督管理、财政、司法行政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暂停从事相关业务1个月至1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发行人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从事上述违法行为，或者隐瞒相关事项导致发生上述情形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五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将中介机构遵守本规定的情况纳入证券市场诚信档案。

第十六条 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违反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给予发行人或者中介机构奖励的，应当追回，并由有关机关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十七条 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提供服务的，参照适用本规定。

第十八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财政、司法行政等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2025年2月15日起施行。

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纠纷的管辖确定

来源：山东高法 发布时间：2025年2月7日 00:06

信息网络原址：https://mp.weixin.qq.com/s/a61Q8lkdGln3eoDae_WmRA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参考案例《广东富某建设有限公司诉广东金某集团有限公司、新兴县新某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入库编号：2024-01-2-115004）》（以下简称《参考案例》）的裁判要旨明确：“实践中，消防及空调安装工程，不仅包括消防和空调设施设备安装，还涉及大量管网铺设等隐蔽工程，施工成果直接添附于总工程项目上，与项目工程本身的关联度高，属于建设工程范畴。因此，当事人因履行消防及空调安装工程合同发生的纠纷，不宜认定为承揽合同纠纷，应当认定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该案例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与承揽合同纠纷的区分规则作了明确，为类似案件的管辖确定提供了指引。

实践中，关于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纠纷、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等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纠纷的管辖确定仍存在争议。因此，有必要结合相关规范性文件、《参考案例》的裁判要旨，进一步梳理并明确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纠纷的管辖确定规则。

一、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理解不一导致相关规范的适用统一性受到影响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作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子案由，且与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纠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等处于同一级别案由。可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不包括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纠纷等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纠纷。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中指出:“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精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并不限于本案由中的第四级案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还包括第四级案由‘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铁路修建合同纠纷’‘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这里也将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等部分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纠纷认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而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纠纷、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等则应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

然而,实践中各地法院存在不同观点和做法。例如,有的法院将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纠纷、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指明由建设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甚至工程款债权转让、债务人与受让人因债务履行发生的纠纷也由建设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可见,由于对《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存在不同理解且尚无法律明文规定,实践中对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纠纷、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等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纠纷是否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进而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存在分歧,这也对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及《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适用统一性造成影响。

二、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进行目的性扩张的必要性

目的性扩张一般是指法律文义所涵盖的情形不能贯彻该规范的意旨,显有越过该规范文义的必要,以将其适用范围扩张至该文义原不包括的情形。基于此,目的性扩张的前提便是基于规范意旨有必要将本不属于某一条文适用范围的案件纳入该条文适用范围,并且无法通过扩大解释将案件纳入该条文适用范围。

第一,有必要将部分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纠纷纳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认定范围。一般认为,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规范意旨在于方便法院调查相关不动产状况及后期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也指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往往涉及建筑物工程造价评估、质量鉴定、留置权优先受偿、执行拍卖等,由建筑物所在地法院管辖有利于案件的审理与执行。”概括而言,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及《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范意旨主要有二:**一是便于法院查明与建设工程紧密关联的案件事实;二是便于法院后期对建设工程本身进行执行。**基于此,至少部分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纠纷应纳入《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中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认定范围。

例如，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监理服务通常在建设工程所在地开展，服务内容一般是工程质量控制、施工安全监督等，为查明案件事实，由建设工程所在地法院管辖更为妥当。

第二，扩大解释无法满足法律适用需求。《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中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也并非《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规定的案由，因此有观点认为，该条款中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亦并非仅指《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通过扩大解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可以囊括其他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纠纷。然而，从文义的角度来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文义范围至少无法涵盖诸如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换言之，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已经突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文义范围的极限，无法通过扩大解释将前述纠纷纳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认定范围。

因此，严格遵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文义范围确定管辖有悖于规范意旨，有必要对其进行目的性扩张，使其认定范围能够涵盖更多的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纠纷，以实现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及《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范意旨。

三、以“事实查明或案件执行与建设工程本身的紧密关联性”为标准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如前所述，有必要通过目的性扩张拓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认定范围。当然，并非所有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纠纷均可认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否则与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的纯粹买卖合同纠纷都可能被纳入认定范围，将导致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纠纷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的范围不当扩大。因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目的性扩张需紧密围绕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及《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范意旨展开，进言之，可以“事实查明或案件执行与建设工程本身的紧密关联性”为标准认定《民诉法解释》第二十八条中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具体而言，事实查明或案件执行与建设工程本身的紧密关联性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判断。

第一，合同标的是否直接转化为建设工程的组成部分。所谓直接转化，是指不经过中间事物径直转变。由此能够排除将诸如为施工而订立的建材、设备等买卖合同纠纷认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可能，避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认定范围的不当扩大。

当合同标的已经直接转化为建设工程的组成部分时，诸多案件事实需依托于建设工程本身方得以查明，这一点在《参考案例》的裁判要旨中亦有所体现。因此，当合同标的直接转化为建设工程的组成部分时，一般应肯定事实查明与建设工程本身的紧密关联性。

第二，合同核心履行内容是否大部分在建设工程项目现场进行。合同核心履行内容系指为实现合同目的不可或缺且在人力、物力、时间等履约成本中占比最大的履行内容。当合同核心履行内容大部分在建设工程项目现场进行时，诸多案件事实也需依托于建设工程本身方得以查明。因此，当合同履行大部分时间在建设工程项目现场时，一般也应肯定事实查明与建设工程本身的紧密关联性。据此，例如建设工程设计合同虽然需要前期一定的实地勘察，但其核心的设计工作却大部分在设计单位内完成。故而，不宜将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认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适用不动产专属管辖。

第三，案件执行标的物是否明确为建设工程本身。此处的明确，系指假设当原告诉讼请求得到支持时，执行标的物必然是建设工程本身。由此能排除将诸如可能导致建设工程作为执行标的物的借款合同纠纷认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可能，避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认定范围的不当扩大。当案件执行标的物明确为建设工程本身时，如果由建设工程所在地外的法院管辖，将增加后期执行的成本。因此，当案件执行标的物明确为建设工程本身时，应肯定案件执行与建设工程本身的紧密关联性。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首批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典型案例

案例目录

案例一 准确判定高管自我交易行为 及时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上海兰某贸易有限公司与江某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

案例二 准确查明和适用外国法律 依法维护外国投资者股东权利——韩国T某株式会社与天某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曹某铉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案例三 准确判断公司僵局 依法判决解散公司——德国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北京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

案例四 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中采取行为保全 避免对公司利益造成进一步损害——日本东京A株式会社与松某申请行为保全案

案例五 释法增信促推中外当事人继续合作 实质性化解合资经营企业纠纷避免“程序空转”——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与优某橡胶有限公司、日本横某株式会社等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

案例一：准确判定高管自我交易行为 及时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上海兰某贸易有限公司与江某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3年9月，法国兰某公司与法国、比利时其他投资人共同设立上海兰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兰某公司）。江某担任上海兰某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管理工作。2017年9月，上海兰某公司与澜某公司签订《装潢工程合同》，委托澜某公司对办公场所进行室内装修。后嘉某公司替代澜某公司进场施工，上海兰某公司向嘉某公司支付装修款1,508,323.50元。江某的配偶钟某持有嘉某公司99%股权，但江某未向上海兰某公司报告该情况。上海兰某公司认为，江某利用职务之便，通过与嘉某公司签订合同，将远高于实际费用的装修费用转移至嘉某公司及钟某名下，江某及嘉某公司存在侵占上海兰某公司财产的行为，故诉请主张赔偿。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同意外，不得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本案中，江某系上海兰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上海兰某公司章程未规定准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的情况下，江某欲促成嘉某公司与上海兰某公司开展交易，理应基于自身负有的忠实义务，主动向上海兰某公司股东会披露其配偶钟某持有嘉某公司99%股权并直接控制公司的事实，以便上海兰某公司股东会决定是否同意与其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江某故意隐瞒其与嘉某公司的高度关联关系，代表上海兰某公司与嘉某公司进行交易，违反了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遂判决江某与嘉某公司、钟某将超出市场公允价值的交易所得342,861.50元返还给上海兰某公司。一审判决后，各方均未上诉。

三、典型意义

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进行投资时，往往依靠企业高管对其投资设立的企业进行管理，公司法关于高管对公司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的规定是保障外国投资者权益的重要法律依据。外商在中国投资设立的公司属于中国的市场主体之一，受中国公司法的平等保护。本案对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自我交易进行实质性解释，将自我交易的范围由高管本人扩大解释至高管人员的近亲属或近亲属直接控制的企业，彰显了公司法规范高管行为、维护公司利益的制度价值。2023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款将自我交易的范围扩大至包括“其近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本案采取的实质性解释方法在公司法修订中得到充分认可和体现。

四、裁判文书

【一审案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02民初55号

案例二：准确查明和适用外国法律 依法维护外国投资者股东权利——韩国T某株式会社与天某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曹某铉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韩国T某株式会社系在韩国登记设立的公司，社长为曹某铉。2002年，韩国T某株式会社在江苏省无锡市设立天某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某公司），持有天某公司100%股权。从2018年4月起，韩国T某株式会社通过派员上门、邮寄律师函、发送通知等方式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均被天某公司拒绝。韩国T某株式会社向法院起诉，要求天某公司提供自2006年8月1日起的全部董事会会议决议、股东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公司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以供查阅、复制。天某公司主张，韩国T某株式会社确认曹某铉为社长的董事会决议无效，曹某铉无权代表韩国T某株式会社起诉。

二、裁判结果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曹某铉是否有权代表韩国T某株式会社提起本案诉讼应适用该会社登记地法律即韩国法律进行判断。根据韩国商法的规定，公司应以董事会的决议选任代表公司的董事。韩国T某株式会社章程规定，社长系根据董事会的决定从董事中选任；社长代表本公司。2018年4月17日韩国T某株式会社董事会出席人员符合章程规定，董事会决议确认曹某铉为社长，决议有效。曹某铉亦是韩国T某株式会社商业登记证载明的代表人，有权代表韩国T某株式会社提起本案诉讼。韩国T某株式会社作为天某公司股东的权利问题应适用天某公司登记地法律即中国法律。根据中国公司法规定，韩国T某株式会社行使股东知情权合法有据。该院判决天某公司提供全部董事会会议决议、股东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供韩国T某株式会社查阅、复制；提供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供韩国T某株式会社查阅。天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股东知情权诉讼，案件中存在多个法律关系，需要分别确定准据法。法院针对外国法人的诉讼代表权、中国公司的股东权利两个问题分别确定韩国法和中国法为准据法，对案件审理涉及的域外法即韩国法进行了准确查明和适用，确认了韩国T某株式会社社长曹某铉的代表资格；适用中国公司法关于股东权利的规定，支持了韩国T某株式会社对其投资的天某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的请求。该案彰显了中国法院准确适用外国法律解决当事人争议、维护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理念，增强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兴业的信心。

四、裁判文书

【一审案号】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2民初486号

【二审案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苏民终160号

案例三：准确判断公司僵局 依法判决解散公司——德国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与北京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北京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艾某公司）是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德国艾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国艾某公司）持有北京艾某公司90%股权，北京惠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惠某公司）持股10%。北京艾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北京惠某公司委派1名，德国艾某公司委派2名，董事任期为三年。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董事长由德国艾某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长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由董事长负责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方能举行，其中至少有双方各自委派的一名董事参加。合营企业章程的修改，合营企业的中止、解散等重要事项由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议。

2020年9月15日，北京艾某公司召开线上董事会会议，因不能达成一致，德国艾某公司单方签署《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同日，北京惠某公司单方签署《股东会决议》，解除德国艾某公司股东资格。德国艾某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及快递方式通知北京艾某公司行使股东知情权，查询北京艾某公司财务，快递被拒收，邮件未回复。德国艾某公司诉至法院，请求依据公司法（2018年修正，下同）第一百八十二条及公司章程解散北京艾某公司。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北京艾某公司经营期间，中外方股东之间发生严重分歧为不争的事实，但股东之间存在矛盾不等同于北京艾某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根据法律规定以及北京艾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北京艾某公司董事会仍能有效作出决议，并未落入无法形成有效意思表示的僵局状态，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之情形，判决驳回德国艾某公司的诉讼请求。德国艾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其侧重点在于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存在严重的内部障碍。

股东会或董事会机制长期失灵、股东因矛盾激化内部管理存在严重障碍、一方股东无法有效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已陷入僵局状态，可以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按照北京艾某公司章程规定，只要双方出席的董事意见存有分歧、互不配合，就无法形成有效表决，影响公司的运营。自2020年9月15日以来，北京艾某公司长期无法召开董事会，无法形成有效决议，更不能通过董事会解决董事间激烈的矛盾，董事会机制严重失灵，北京艾某公司的内部机构已不能正常运转，公司经营管理陷入僵局。根据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规定，北京艾某公司可以在外商投资法施行后5年内按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调整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并依法办理变更登记。现北京艾某公司的僵局已通过其他途径无法解决，对德国艾某公司要求解散北京艾某公司的请求应予支持。两方股东如仍有意愿，可依据外商投资法重新调整设立符合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规定的公司。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解散北京艾某公司。

三、典型意义

在遇到公司经营发生严重问题，董事会或股东会等公司内部运行机制失灵，公司已经丧失人合性基础时，法律规定允许当事人运用司法解散的方式来解决公司困境，以避免损害股东利益。本案中，对德国艾某公司提出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立足平等保护理念，结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这类公司的特殊组织形式，对司法解散公司的要件进行了综合分析，合理判断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实际运行状态，充分论证了司法介入公司治理、破解公司僵局的必要性和限度。同时，为引导相关主体完善公司治理、规范经营行为，依法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还结合外商投资法5年过渡期的规定，指引合作双方可以重新选择合作形式，鼓励当事人通过意思自治实现合作共赢。既有利于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又体现鼓励中外投资主体修复合作关系的价值取向。

四、裁判文书

【一审案号】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4民初942号

【二审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京民终596号

案例四：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中采取行为保全 避免对公司利益造成进一步损害——日本东京A株式会社与松某申请行为保全案

一、基本案情

中山市泰某公司（以下简称泰某公司）是外商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日本东京A株式会社（以下简称A株式会社）系其唯一股东。松某任泰某公司董事、总经理，并担任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泰某公司章程》载明，泰某公司股东有权任命和更换董事、修改公司章程，董事会由3人组成，设董事长1名、董事2名，由股东委派产生，公司设总经理一名，法定代表人由总经理担任，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2022年4月19日，A株式会社根据其董事会决议作出股东决定，免去松某的泰某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修改《泰某公司章程》中总经理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条款，改为董事长担任法定代表人；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董事长三某担任。A株式会社随后签署了对松某的董事免职书。同日，泰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决议免去松某总经理职务。上述泰某公司股东决定、董事会决议作出后，A株式会社派人前往泰某公司就任总经理，并与松某交接工作、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等手续。松某拒不移交公司证照，亦不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致使泰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无法完成。同时，松某擅自处置转移泰某公司财产，并以泰某公司的名义实施了一系列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对泰某公司和A株式会社的利益造成威胁。A株式会社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松某返还泰某公司证照。期间，A株式会社申请行为保全，要求禁止松某本人或授权任何人使用、重新刻制、隐匿泰某公司公章及其他公司印章，禁止松某本人或授权任何人代表泰某公司签署任何文件，责令松某在指定期限内将泰某公司印章、营业执照等公司证照移交给指定的第三方单位代为保管。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裁定认为，根据泰某公司股东A株式会社的决定，松某已不再担任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总经理职务亦根据泰某公司董事会决议予以免除，其无权在未经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对外代表泰某公司签署文件及从事活动，亦无权代表泰某公司保管公司印章、营业执照、财务账册等资料。

松某拒不执行A株式会社决定及泰某公司董事会决议，拒不办理有关交接手续，并擅自以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实施一系列损害泰某公司利益的行为，使泰某公司脱离了其唯一股东A株式会社的控制，严重影响了泰某公司的正常经营，如不及时采取行为保全将会使A株式会社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该院遂裁定：禁止松某本人或授权任何人使用、重新刻制、隐匿泰某公司公章及其他公司印章，禁止松某本人或授权任何人代表泰某公司签署任何文件，责令松某三日内将泰某公司印章、营业执照等公司资料移交给指定的第三方单位代为保管。该裁定作出后，松某申请复议，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松某的复议请求，维持原裁定。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在公司证照返还纠纷中，人民法院依法采取行为保全措施的典型案例。外商独资企业泰某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拒绝执行股东决定和董事会决议，并利用登记注册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及掌管公司证照的便利，实施损害泰某公司利益的行为。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行为保全的规定，及时裁定行为保全措施，责令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作出一定行为同时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避免了损害进一步扩大，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有效保障了股东对公司合法权利的行使，维护了外商投资企业的正常经营，体现了人民法院积极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作用。

四、裁判文书

【一审案号】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2071民初20265号之一民事裁定、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2071民初20265号之二民事裁定

案例五：释法增信促推中外当事人继续合作 实质性化解合资经营企业纠纷避免“程序空转”——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与优某橡胶有限公司、日本横某株式会社等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05年，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与优某橡胶有限公司签订《中外合资经营公司合资合同》，约定双方在山东省设立山东某橡胶公司，中方占股22.98%，日方占股77.02%。合资合同中约定合资公司负责生产并向优某橡胶有限公司的全资股东即日本横某株式会社销售产品，产品价格由合资公司自主决定；如因产品价格产生争议，中外股东和合资公司三方应协商解决，无法解决时按照该合资合同的仲裁条款处理。在合资经营过程中，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认为优某橡胶有限公司利用其控股股东身份，低价向其母公司日本横某株式会社销售产品，损害了合资公司利益，遂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要求日本横某株式会社、优某橡胶有限公司赔偿合资公司损失。优某橡胶有限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张案涉合资合同订有仲裁条款，案涉纠纷应通过仲裁解决。

二、裁判结果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当事人的约定及合资合同的仲裁条款，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的起诉。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方面，因存在有效仲裁条款，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不得对优某橡胶有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另一方面，因日本横某株式会社并非合资公司的控股股东等关联方，案涉产品销售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起诉日本横某株式会社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二审法院据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申请再审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原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为由裁定提审该案。再审中，经最高人民法院调解，四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约定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撤回本案起诉，各方继续合作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裁定：准许山东跃某胶带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撤销本案一、二审裁定。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从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合资公司生产经营状况、中外双方股东均具有继续合作意愿、各方当事人虽经历一、二审程序但并未实质性解决矛盾等因素，在开庭审理后多次与各方当事人电话沟通，并赴当地召集当事人言调促和，向中外当事人释明我国法律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东权益保护、股东代表诉讼机制、仲裁协议等相关领域的规定，释法增信、答疑解惑，有效解开当事人心结。最终促使合资公司和中外双方股东以及外方股东的母公司四方当事人圆满达成和解协议。本案成功和解，以最小成本使得纠纷得以实质性化解，合资企业恢复正常经营，是司法助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典型案列。

四、裁判文书

【一审案号】（2021）鲁07民初718号

【二审案号】（2022）鲁民终1505号

【再审案号】（2024）最高法民再236号

入库参考案例解读：股东能否以其对公司的债权与出资义务进行抵销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2025年01月16日 07:03

信息网络原址：https://mp.weixin.qq.com/s/CnMm4qliZhqxTv7AwKDH_w

股东能否以其对公司的债权与出资义务进行抵销——《北京某建材公司诉北京某科技公司、马某等买卖合同纠纷案（入库编号：2023-08-2-084-028）》解读

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八条增加列举“债权”作为非货币财产出资方式，正式认可债权出资的法律地位。债权出资，包括以股东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出资和以股东对公司享有的债权出资。其中，以股东对公司享有的债权出资又存在两种形式：一是以股东对公司享有的债权增资入股；二是在已认缴出资的情形下，以股东对公司享有的债权抵销出资义务。债权增资入股情形下原债权人转变为公司股东，不损及原有公司资本，实务均予认可。但是，股东以其对公司享有的债权抵销其对公司负担的出资义务应否许可，实践认识不一。对此，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北京某建材公司诉北京某科技公司、马某等买卖合同纠纷案（入库编号：2023-08-2-084-028）》明确了股东以其对公司的债权与出资义务相互抵销的适用条件，即“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以其对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抵销出资义务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应当通过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将出资方式变更为债权出资，并确认实缴出资；二、前述股东会决议作出时，公司应当具有充足的清偿能力；三、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应当经公司登记机关备案。对于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为类案裁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规则指引。现就有关问题解读如下：

一、股东以其对公司的债权与出资义务相互抵销的实质要件

股东主张以其对公司的债权与出资义务抵销属于债法与组织法交叉问题，既要满足合同法关于抵销的要件，也要符合公司法对于公司资本充实的要求，还要受到破产法规制偏颇清偿的约束。股东以其对公司的债权与出资义务抵销应以公司具有充足的清偿能力为实质要件，否则将侵蚀公司资本制度，损害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第一，从合同法上看，若公司资不抵债，债权人存在不能从公司获得足额清偿的风险。此时，允许股东以其对公司享有的难以足额受偿的债权抵销本应全额缴纳的出资义务，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八条第一款“标的物品质相同”的抵销要件。

第二，从公司法上看，公司资本是公司财产的原始来源，具有经营功能和担保功能，是公司经营的基础和债权人利益的保障。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对于确保公司资本的充实性具有重要意义。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出资，并设立禁止抽逃出资、严格规制非货币出资、严格限定利润分配条件等一系列配套规范。公司不具有充足的清偿能力时，允许股东以其对公司享有的难以足额受偿的债权抵销本应全额缴纳的出资义务，会严重减损公司资本的充实性。

第三，从破产法上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股东不得以对公司的债权抵销欠缴的出资。当公司不具有充足的清偿能力但未申请破产时，允许股东以其对公司享有的难以足额受偿的债权抵销本应全额缴纳的出资义务，实质产生该股东优先于公司其他债权人受偿的效果。特别是公司其他债权人对公司享有的债权陷入执行不能时，股东应当先足额缴纳全部出资，再通过执行或者破产程序，与其他债权人平等地向公司主张权利。

本案例中，北京某科技公司曾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后经法院准许撤回破产清算申请。尽管在形式上，北京某科技公司未处于破产程序中，但法院执行裁定已认定北京某科技公司名下暂无财产可供执行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此外，在北京某科技公司临时股东会关于马某以其对公司的债权抵销出资义务的决议作出时，已有债权人对北京某科技公司提起诉讼。据此，应当认定北京某科技公司已不具备充足的清偿能力，即便临时股东会决议真实有效，因马某主张以其对公司的债权抵销出资义务客观上将导致马某获得偏颇清偿的效果，故不应得到准许。

二、股东以其对公司的债权与出资义务相互抵销的形式要件

股东以其对公司的债权与出资义务抵销的本质，是将股东的出资方式由货币出资变更为债权出资。因非货币出资的财产价值具有不确定性，货币出资与非货币出资存在重大差别，在法律上受到更加严格的规制。公司设立时确定的出资方式是股东协商的结果，出资方式的变更关涉其他股东、公司乃至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公司法明确要求在公司章程中载明股东的出资方式，同时规定用以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评估作价。

因此，股东以其对公司的债权与出资义务抵销必须经评估作价，通过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中载明的出资方式为债权出资，并在章程中确认股东已实缴出资。

同时，股东通过公司决议以对公司享有的债权抵销出资义务，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不易为公司外部债权人知悉。如无一定的公示机制，股东可能与公司其他股东串通，在公司资不抵债后，倒签股东会决议作出的时间，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在修改公司章程载明的出资方式和实缴出资额后，应当将新的公司章程向公司登记机关备案。另外，结合公司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日期，属于公司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因此，公司还应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股东出资方式的变化以及实缴出资的数额和日期。否则，抵销行为不得对公司债权人产生不利影响。

本案例中，北京某科技公司2018年4月26日作出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同意马某以其对公司的债权抵销其出资义务，将马某出资方式修改为货币、债权，确认实缴全部出资，但该股东会决议未经公司登记机关备案。2018年5月7日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的公司章程亦未按照前述决议内容进行修改。北京某科技公司2019年6月26日公示的2018年度企业年报仍载明，马某认缴出资额165万元，实缴出资额61.75万元，并非已实缴全部出资。故综合本案事实，马某经临时股东会决议抵销其出资义务的主张不得对抗债权人北京某建材公司。因此，北京某建材公司依法有权请求马某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北京某科技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本案例明确股东以其对公司享有的债权与其对公司负担的出资义务抵销所需满足的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为公司法新增债权出资规范的具体适用和实务认定提供了有益路径参考。

《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逐条解读与制度创新

来源：商法李建伟 发布时间：2025年02月12日18:57

一、公司登记法的阶梯

关涉公司登记的规范的现行法律很多：最上位规范是民法典第三章法人第一节一般规定，其中有五六个条文涉及到公司登记。以及2023年的《公司法》第二章公司登记，相比原来的公司法而言单设了公司登记一章。其次，2021年公布了《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涵盖了所有的市场主体，但实际上，它主要的规范假象主体仍是公司。接下来，2022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该《实施细则》作为部门规章，有许多许多关涉配套制度的规定。最后，最低效力层次的规范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关于公司登记的若干个具体制度颁布一些法律性文件。比方说，我国曾颁布过《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已失效），《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等。单位也有一些具体的规定。

《办法》实际上不是单项的规定，它是建立在民法典和公司法典关于公司登记的基本规定的基础上，以及又借鉴了《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以及总结对当前大众提出的基本问题的回应，从而形成了现在的《办法》。

二、逐条讲解

第一条规定该《办法》是根据以上所说的法律、行政法规制定的。

第二条规定无论是备案还是登记，当事人提交的材料要真实、及时、完整。即强调真实登记。因为市监局作为公司登记机关，只是被动地接收材料，材料的真实性是由登记申请人，即公司来控制的。

第三条规定要顺应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公司登记机关要规范履行登记管理秩序，维护诚信安全的市场秩序。

第四条规定公司设立登记完成之后，要领取一个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应该载明下列事项：（一）名称；（二）住所；（三）法定代表人姓名；（四）注册资本；（五）公司类型；（六）经营范围；（七）登记机关；（八）成立日期；（九）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需要强调的是法定代表人的姓名是营业执照记载事项，也是公司登记事项，但不是公司章程记载事项，只是公司章程需要记载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办法。如果普通的董监高不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监高，它就不是登记事项，也不是营业执照载明事项，只是一个备案事项。

第五条规定公司登记资本要真实。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五年认缴制，还是普通的股份有限公司的实缴制，都不再要求验资了。出资真实不真实？是通过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自行展示出来。但是有一个情形需要验资，出于维持资本市场的秩序，上市公司，即以采取向社会公开募集设立的方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办理登记时应当提交验资证明。

第六条规定的贡献是虚拟资产是可以用于作价出资的。在第三部分重大创新里讲解。

第七条规定增加注册资本时，与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时一样遵循有限责任公司的五年认缴制，股份有限公司的实缴制。第一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时，公司的注册资本登记变更时无需实缴，按照章程规定自注册资本登记变更之日起5年缴足即可，强调了增资时五年认缴制的起算时点。第二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如果是为增加注册资本发行新股的，应当是实缴完毕之后，公司才能去变更注册资本登记，即实缴制在增资时的坚守。

第八条规定2024年6月30日前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践行五年认缴制或实缴制的过渡方案。可以简单理解为宽限三年。

第九条规定豁免审查的制度。2024年6月30日前登记设立的公司生产经营涉及国家利益或者重大公共利益的，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提出意见，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同意，可以按2024年6月30日前确定的出资期限出资，就无需受到五年认缴制与实缴制的限制。《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中也有该规定。

第十条规定背景是之前实践中出现了高达9840亿人民币，10万多亿人民币的天价认缴出资额。因此该条规定在2024年6月30号之前设立的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机关应当对出资的真实性、合理性进行审核。（一）认缴出资期限三十年以上；（二）注册资本十亿元人民币以上；（三）其他明显不符合客观常识的情形。《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中也有该规定。

第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一名股东认缴巨大出资额且都实缴了，公司自行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来公示这些信息，从而彰显公司的资本信用力。

第十二条规定公司的经营范围问题，公司经营范围应当符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规定，外商投资公司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直接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还应当符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规定。

第十三条规定在董事备案时标明相关董事担任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信息。上市公司、国有出资公司现在已经是单层制公司治理结构，其他公司也可以选择单层制公司治理结构，选择单层制公司治理结构标志就是不再设置与董事会相平行的监事会或一名监事，而是在董事会下面设立审计委员会。假设一个公司里有9个董事，不可能9个董事全部都担任审计委员。董事、监事和高管都是属于备案的内容。但是现在没有监事会，因此没有监督监事的公示了。但是其实董事里又一分为二，有兼任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董事，有不兼任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董事。怎么来区分呢？因此应该在备案信息中公示兼任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董事的信息。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监事身份公示的一种变相延续。

第十四条规定中国版公司秘书制度。在第三部分重大创新里讲解。

第十五条规定董监高及时解职。在第三部分重大创新里讲解。

第十六条规定申请人可以委托中介机构或者其他自然人代其办理公司登记、备案。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其他自然人代为办理公司登记、备案事宜，应当诚实守信、依法履责。实践上许多公司的登记不成立，都是因为中介机构耍花招所导致的，所以强调如实登记。

第十七条规定保证公司登记信息的真实性。许多地方正在推广这个措施。当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等被依法限制人身自由，无法通过实名认证系统、本人现场办理或者提交公证文件等方式核验身份信息的，可以通过变通的方式进行实名验证，比如通过电子进行人脸验证。

第十八条规定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登记要求有所放松。近几年放管服改革、鼓励万众创业，全民创新，因此现在对于住所和经营场所登记要求没有原来要求那么死板了，有所放松。所以第十八条也反映了这改革的精神。

第十九条规定不予登记的各种情形。公司申请登记，市监局实际上既不是进行形式审查，也不是进行实质审查，精确地说是进行审慎的审查。因为市监局的工作人员都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工作人员不仅审查公司的材料是否形式符合，当发现公司递交的材料有明显的异样时，市监局是不予登记的。公司对不予登记不服，可以去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市监局就是可以依据以下六种情形不予登记。（一）公司名称不符合企业名称登记管理相关规定的；（二）公司注册资本、股东出资期限及出资额明显异常且拒不调整的，如前述的认缴出资期限三十年以上或者注册资本十亿元人民币以上；（三）经营范围中属于在登记前依法须经批准的许可经营项目，未获得批准的，比如金融业需要先审批经营范围；（四）涉及虚假登记的直接责任人自登记被撤销之日起三年内再次申请登记的；（五）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这往往是实践中市监局不予登记的理由；（六）其他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

第二十条是不予登记制度。在第三部分重大创新里讲解。

第二十一条规定歇业备案制度。在《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早已规定了歇业登记备案制度，这一条进行了重复规定。

第二十二条规定注销登记制度。当股东死亡、注销或者被撤销的，导致公司无法注销登记的，应该怎么变通实现？实践中之前一人公司的唯一股东死了，而且也无继承人时，此时公司要进行注销登记，应该谁来代为注销登记成为难题。在此之前，因为没有法律规定，此问题成为死结，甚至有公司登记机关要求所有技术人员都要在场，缺一个都不办理注销登记。而这条规定进行了指导——可以由该股东股权的全体合法继受主体或者该股东的全体投资人代为依法办理注销登记相关事项。

第二十三条规定涤除登记制度。我认为这是《办法》的最大的亮点。在第三部分重大创新里讲解。

第二十四条规定另册管理制度。2024年6月30日前登记设立的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公司登记机关对其另册管理。不再展开讲解。

第二十五条规定社会信用代码制度。社会信用代码具有唯一性与重要性。

第二十六条规定如果代理公司登记的中介机构违反了诚信原则，要受到处罚。通过管好中介机构行为，有利于提升中国的登记秩序。

三、重大创新

(一) 出资财产拓展

数据、网络虚拟财产显然是一种财产权益，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它属于一种非实体财产。按照公司法确定的基本原则，能够作价出资给公司的财产类型只需要符合两个要件：第一，有财产价值能够评估作价。第二，能够转让。

网络虚拟财产一般是可以转让的，比如早期网络上的游戏装备是可以转让的。至于说评估作价，可能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可能有公允的市场价格，总之它是可以评估作价的。当年拓展股权债权出资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一次规定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没有绝对说可以，也没有绝对说不可以，具体是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呢？需要进一步的规定，将来可能借助于别的行政规章，也有可能借助于更高级别的法律、行政法规决定。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第六条强调了“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属等有规定的，股东可以按照规定用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作价出资。”这表明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用于出资，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能够评估作价，二是能够转让，三是能够确权。就确权而言，不管是网络上的登记、备案、还是有特别标志都可以。

(二) 登记联络员备案

2023年公司法修订没有引入英国式的公司秘书制度，香港地区采用的是英国公司法的公司秘书corporate secretary。公司秘书的职责是什么呢？在香港注册公司，至少得设立一个公司秘书，负责公司与外部的联系。公司秘书还要负责保管公司的印章，负责保管公司的基本的财务会计材料。

过去几十年以来，我国大陆实践中面临着一个严重问题：找不到有些公司，诉讼时诉讼文书都不知道发给谁，只能依赖公告送达。但是公告送达严重地降低了诉讼效率。虽然《公司法》虽然没有引入公司秘书制度，但是《办法》第十四条引入登记联络员制度。登记联络员就起到了和公司秘书一样的作用的。意味着将来公司登记无论如何得有一个登记联络员。

这一条文规定得很简单，登记联络员是市监局与公司之间联系的纽带，保证市监局能够联系上公司。因此登记联络员至少有一个，多个也行，登记联络员变更的，需要及时备案，如果没有，市监局就可以处罚。市监局建立登记联络员制度，不仅仅便于市监局工作，而且法院或成最大受益人。

谁来担当登记联络员呢？

当时起草时讨论能不能允许社会中介机构来担当登记联络员？如果是允许社会中介机构来担当的话，一个中介机构可以作为好多公司的登记联络员。但专家担忧允许公司外部人成为登记联络员，可能会偏离登记联络员制度的初衷，导致仍然联系不上。所以最终就确定了一个保守的方案，登记联络员可以由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员工等人员担任。我理解认为“等”是指公司内部人，而非指公司外部人。因为要确保联络到登记联络员，登记联络员必须是自然人。且必须登记上其电话号码，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实际上我觉得通讯地址也是必须的，但是法条没有明文规定通信地址，仅规定了“等”字。

（三）董监高及时解职

第十五条规定的董监高及时解职制度，与《公司法》第178条规定相配套。第《公司法》第178条规定董监高在任职期间具有五种消极资格之一的，公司应当解除其职务。但没有规定多长时间解职。因为实践中出现了有一些法定代表人在监狱里的服刑多年，却仍担任公司的董事长的情形。所以第十五条规定了公司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原则上不得超过三十日；并应当自解除其职务之日起三十日内依法向登记机关办理备案。因为董监高不是登记事项，是备案事项，所以需要变更备案。

解职程序：如果是职工董事，则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进行解职；如果是国资委委派的董事，则由国资委进行解职；但更多的董事是由股东会选举而来，则召开股东会进行解职；如果是高管，则召开董事会进行解职。

但该条文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即公司可能会充当一个睡不醒的人，公司里的人装傻就是不去进行解职，此时我认为可以建立一个法院与市监局的信息联动机制，以利于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以开启起算时点。

最后一点是30日的期限如何确定的？我当时在起草时表达，至少不低于法定代表人辞任后确认新继任人的时间要求。因为《公司法》第10条第3款规定法定代表人辞任的，公司应当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当然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与解职本身没有必然联系。但考虑到是法定代表人可能本身就是董监高。如果法定代表人的重新确认继任人选的时间需要30天的话，我觉得这个及时解职应该比照30天或者更短。最后市场监管总局最终颁布的法律条文也采用了30天。

（四）股东、法代、董监高涤除登记

第二十三条规定涤除登记制度是第四个重大创新。举个例子方便理解，张三本来只是一个小股东，但之前担任了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1年后发现公司风险很大，决定辞任法定代表人，公司有义务在30天确定继任者李四的，按理确定继任者后就应该进行变更登记，但是公司就是不配合进行变更登记，就会造成公司法定代表人内外不一致，内部法定代表人是李四，但外部法定代表人仍是张三。当法院因为公司债务履行不了要将法定代表人列入黑名单时，只会将外部法定代表人张三列入黑名单，对张三极为不公平。不过如果有继任者，其实进行变更登记问题还不大。

但是如果公司迟迟没有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问题就比较大了。如果市监局进行涤除登记，就会出现没有登记法定代表人的公司的情形，如果该情形仅是小范围的暂时的，倒也可以容忍，但是就怕进行涤除登记后该情形会出现大范围长期的，就无法容忍了，严重影响市场秩序。故许多市监局都不去做涤除登记，给出的理由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律仅规定了市监局有设立登记、注销登记。变更登记的权限，而涤除登记是撤销登记的状态，或者对某一个登记的事实进行撤销的行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登记状态。但不进行涤除登记，却会忽视大量无辜张三的需求。

此时第二十三条规定创新之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无法涤除登记的问题。当A被冒名登记为法定代表人，当A打赢了民事官司，获得胜诉判决，要求停止侵害，而停止侵害即停止登记，也就是涤除登记，法院就可以向市监局发一个协助函，要求市监局协助执行，此时市监局就可以办理涤除登记。不仅限于涤除法定代表人信息登记，也包括涤除董监高信息备案。需要注意的现实中张三自行拿着胜诉判决去市监局申请涤除登记，大概率不会得到市监局的配合。张三应该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向市监局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市监局才会配合进行涤除登记。虽然我觉得这本质上就是一回事，但是现实执法却不是如此。工商登记的唯一登记申请人只能是公司本身。

（五）不予登记

第二十条规定是有着巨大争议的重大条款，当有证据证明申请人明显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注册资本或者注销公司等方式，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或者规避行政处罚，可能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司登记机关依法不予办理相关登记或者备案，已经办理的予以撤销。该规定的规范本意一定是好的。因为实践中不乏出现当公司出现危急时，为了逃避债务，有实力的大股东立马辞任法定代表人，让一个小喽喽背锅的情况。

如果是颇有实力的股东，2024年7月1日之前把未届出资期限的股权抛售给没有实力的股东，因为没有溯及力，能够逃避出资责任。此时市监局可不可以干预它，不给它变更登记？实际上严格来说，登记不登记并不影响股权变动的效力。我们明年5月份专门有一个周末的课给大家讲股权转让纠纷的解决。但毕竟登记具有对抗效力，此时市监局拦一把似乎有利于保护社会公众利益，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小股东利益。但此时市监局却站在了保护私人利益的第一线，不同立场的当事人之间互相拉扯市监局，市监局就很难办了。

所以我就说，这对律师来说构成一个挑战。当律师正在帮一方当事人打官司时，双方正在激烈地相互起诉，诉讼数十起，甚至都想把对方放到监狱里。此时如果律师能够说服市监局不予登记，将市监局牵扯进来，我觉得能够让激励对抗的当事人之间冷静一下。但产此时市监局责任就大了，极有可能一方当事人盯着市监局起诉、投诉了。但事先市监局只要是立得住、站得稳，就能行得远，也不怕行政诉讼。总之来说，这个制度到底将来能发挥何种作用，还有待观察。尤其是对我们民商事律师如何激活这个制度，可能构成一种考验。有些律师可能能够善于使用这个制度，让市监局参与进来，那就获得暂时性胜利了。

裁判公司纠纷案件的基本理念 | 类案裁判方法

来源：上海一中院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5年02月10日 11:23

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公司纠纷案件有增多趋势，一些案件难以直接从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找到裁判规则。如何快速高效地裁判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件，维护法律关系稳定、促进交易安全便捷、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亟须正确的理念支撑。

公司法集组织法、程序法、行为法于一身，商事法官面对各种类型的公司纠纷案件，除了坚持公司人格独立与股东有限责任的基本原则之外，要树立尊重意思自治与公司正常经营、保障交易安全与股权转让自由的基本裁判理念，确保公司制度的连续性、稳定性。据此，笔者结合审判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对公司法的适用进行探讨，以期促进公司纠纷案件的正确裁判。

一、坚持公司人格独立与股东有限责任的原则

公司人格独立与股东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的两大基本特征，如何将这一抽象理念具象化，落实到个案裁判中，是当前每个从事商事审判的法官需要遵循的底层逻辑。

1. 股东出资构成公司财产

公司独立的法人地位决定了它可以独立地享有财产权，包括物权、知识产权、债权和对外投资的股权以及其他财产权等。公司资产并非某一股东个人的财产，故未经法定程序，股东不得抽回出资或任意进行盈余分配，亦不得随意动用公司财产对他人进行财务资助，否则构成对公司财产权的侵害。

公司以其所有的全部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当财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时，将面临破产。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者认购的股份为限。只要是基于正常投资的交易安排或者款项往来，都应承认相关主体各自财产的独立性，不能动辄要求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动摇有限责任的基石。倘若股东利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自己的有限责任，滥用权利，采用将公司财产与本人财产混同等手段，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则应刺破公司面纱，直索股东个人责任。

当关联公司之间存在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交叉或混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时，应适用公司法规定的横向人格否认制度，甚至可以对已进入破产程序的关联企业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要依法协调好公司债权人、股东、公司等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通过裁判规范股东行为、强化内部监督，实现治理规范、有效制衡、合法经营，推动实现企业法人财产与出资人个人或家族财产分离，明晰企业产权结构。

2. 公司意思存在内外区分

公司不像自然人一样表达意思，公司意思的形成和表达需要经过法定程序，通过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主体实施行为，主要表现为公司内部管理与外部代表或代理行为。公司的内部事务属于公司自治范畴，但在公司与外部第三人的效力上，董事长行为超越授权或董事会没有对经理授权，应当优先保护善意相对人，其所作意思表示对公司具有约束力。要解决好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的限度，理顺公司与法定代表人、董事的委托关系，明确双方均有任意解除权，保障前述职务的无因解除和补偿请求。

同理，监事或者分公司负责人亦可类推适用请求辞去职务并涤除相关登记事项。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借入款项后给自己的其他关联公司使用，不能简单地认定所借款项系法定代表人个人使用或者构成财务混同，如其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条或者愿意为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可依法予以认可。基于特定合作模式的股权并购需要保留被收购方原有业务和人员时，不能以此来认定原股东对公司业务和人员存在过度控制和支配。股权转让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对标的公司不产生约束力，标的公司不必然需要参加股权转让双方的诉讼；股东对公司与他人之间的民事诉讼生效裁判不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无权以股东身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3. 公司主体地位限于法律规定

公司主体资格始于设立登记，终于注销登记，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不影响主体地位的存续，但构成法定的解散事由，应当及时成立清算组清算。在公司解散后，负有清算责任的主体即为清算义务人，公司法规定董事为清算义务人。

如未依法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债权人以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为由请求董事对公司所欠债务承担不能清算的赔偿责任，要审查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是否部分或者全部灭失外，还应审查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是否必然导致无法清算，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是否由董事因怠于履行职责导致，以及是否具有相关免责事由，从而正确认定董事是否构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而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公司债权人并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不掌握公司财务账册，而作为清算义务人的董事，通常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掌握公司的财务资料并了解公司资产状况，应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债权人只要提供公司财产流失或灭失的合理怀疑证据，由作为清算义务人的董事承担反驳该合理怀疑的举证责任。

对于公司股东被冒名登记或者撤销登记，不影响公司对外经营产生的民事责任承担，公司在被撤销登记前具备法人资格，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二、尊重意思自治与公司正常经营

意思自治体现了民商事活动的最基本特征。商事主体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设立、变更与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自觉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公司是股东自治的产物，公司的管理与运营也是公司自治的范畴，司法介入仅是对公司自治机制的补充和救济。

1. 尊重公司发起设立时的约定

公司设立时的发起人可以签订设立协议，明确各自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形成的发起人协议或者约定具有合同相对性，约束股东群体。设立时的股东因履行公司设立职责造成他人损害的，公司或者无过错的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有过错的股东追偿。全体发起人也可以对公司因故未成立的设立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和债务约定责任承担比例。

若公司发起人订立的协议中不仅包含了设立公司的内容，还包含了公司成立后如何运营、双方在公司运营中的权利义务等其他内容的，则应根据具体内容来认定协议的性质。公司成立后，一方诉请解除发起人协议的，应当根据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和判断，不宜简单驳回。虽然公司法第四十九条仅规定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对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仍然可以基于股东之间的约定，要求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2. 确保公司自主经营决策

尊重公司治理模式的自主选择和对董事会、经理等管理层的职权安排。利润是否分配和如何分配，属于商业判断和公司自治的范畴，全体股东可以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配利润。公司可以就分立前的债务清偿与债权人达成书面协议另行约定。

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发行优先股和劣后股、特殊表决权股、转让受限股等类别股，允许公司根据章程择一采用面额股或者无面额股。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可以另行约定或规定不按照股东出资比例减少出资额或者股份。

要依法保障经营自主权，维护公司主体稳定，防止因设立瑕疵而认定无效，以及因成员死亡、退出或少于法定最低人数而解散，或者因轻微违法或者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被强制解散等。无论股权在股东之间转让、公司回购股份、股份转让给公司外第三人还是减资、公司分立等，都有各自的条件和程序性要求。在调解过程中要注意指导当事人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遵守相应程序。

在审理涉及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重大分歧案件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之间不能和解或达成调解协议的，尽量促成当事人通过股权转让、减少注册资本等途径实现纠纷股东的分离，以保持公司作为商事主体的存续，维护公司、股东以及债权人等相关主体的整体利益。

在面临公司僵局时，如果能够通过其他手段解决公司面临的纠纷问题，就不要考虑司法解散，而应当尽量维持公司的存续，毕竟“保留一个运营的公司比解散一个公司要好”。要注重妥善处理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尽可能避免公司僵局，为实现公司治理法治化，促进公司持续稳定经营提供司法保障。应当弘扬企业家精神，鼓励诚实守信经营，股东在转让股权时对公司债权债务的安排，仅约束转让股东与受让股东之间，而不对公司外部债权人产生效力，不得事后以公司名义起诉其中一方股东损害公司利益要求返还，亦不得以对方出资没到位而将其除名。

3. 辨别公司注销时的股东承诺性质

公司法规定了简易注销、普通注销与强制注销三种公司退出的路径，股东承诺愿意对公司债务进行清偿，需要查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是真实承诺还是虚假承诺，探求真实法律关系是债的加入还是担保或单方允诺等。股东在注销公司时作出“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若有未了事宜，股东愿意承担责任”的承诺，应当视为对公司注销时未了结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保结承诺，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第三人书面承诺对被执行人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情形。

在公司未能清偿执行债务且公司注销时未经依法清算的情况下，可以追加作为保结责任人的股东为被执行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明知公司负有未清偿债务，仍以虚假清算材料注销公司，应当认定为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为被执行人的，应予支持。

三、保障交易安全与股权转让自由

公司法属于典型的商事法，商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维护商事交易的效率与安全。在审理公司纠纷案件时，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坚持鼓励交易原则和保障交易安全。

1. 优先保护善意相对人

登记制度是商事外观事实的重要公示方法之一。商事登记分为宣示性登记与设权性登记，登记的注册资本、股东、法定代表人等信息，足以使相对人对公司对外公示的外观事实产生合理信赖。公司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等，均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公司法将维护商事活动安全原则作为基本原则，该价值追求体现在公司法的各项具体制度之中。

比如，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宣告无效、撤销或者确认不成立的，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根据该决议已办理的登记，但根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

如果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则整个交易链可能就会断裂，交易秩序就会受到损害。股权转让的受让人自被记载于股东名册时起可以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而对于股权经历多手转让的出资责任，则需要判别前后手股东之间的相对性，从而确定补充责任的次序。

同时，要准确把握外观主义的边界，避免泛化和滥用。实际权利人与名义权利人之间应当注重财产的实质归属，而不单纯地取决于公示外观。如实际出资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有限责任公司过半数的其他股东知道其实际出资的事实，且对其实际行使股东权利未曾提出异议的，应当支持实际出资人提出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请求。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股东不得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在股权转让与担保的模式下，担保权人受让股权成为名义股东，名义股东的实际地位为债权人，并不负有出资义务，公司债权人无权以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等为由，要求作为名义股东的债权人承担责任。名义股东擅自处分股权，实际出资人不得以此对抗善意相对人。

2. 平等保护合法股权

股权兼有请求权和支配权的属性，具有资本性和流转性，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权益。在民间投融资活动中，融资方和投资者设置的估值调整机制，即通常所说的对赌安排，要遵守公司法和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目标公司股东对投资者的补偿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合同约定的补偿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投资者应当得到约定的补偿。投资方有权要求回购的权利属于兼具形成权和请求权的综合性权利。

一方面，要看当事人是否约定了请求回购的期间，尊重当事人的自由约定，如未在约定期间请求回购的，可视为放弃回购或选择了继续持有。投资方在约定期限内请求回购的，应当从请求之次日计算诉讼时效。

另一方面，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回购的期间，则应以合理期限加以限定，督促及时行使权利，稳定公司经营的商业预期。应当注意审查与股权转让相关合同的具体约定，准确认定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存在以债务清偿为股权返还条件、转让后受让方未接手公司管理、表达了担保意思等不享有股东权利约定的，应当认定为股权转让与担保，股权转让与担保权人仅为名义股东，不实际享有股东权利。股权转让与担保权人请求确认自己享有的股权的，应予支持。从合同目的以及合同是否具有主从性特征来判断股权转让与担保和股权转让。

是否移交公司经营权并非股权转让与担保的必然要件，要综合考虑担保权人的投资和经营贡献、市场行情等因素，运用利益平衡原则，妥善处理因经营损益、股权价值变动等引发的纠纷。对经营权仅在回购期内受到一定限制，并未约定对回购期满后股东权利进行任何限制的，则不同于股权转让与担保中常见的对受让方股东权利进行限制的约定。在清偿完被担保的债务前，股权转让与担保人请求变更股权登记至其名下的，不应当支持。

3. 维护股权转让自由

股权具有财产属性，通过流通产生价值。通说认为，股权转让自由原则是公司制度的灵魂，股东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转让所持股权以及转让的对象、时间、数量、价格等，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强制股东出让股权。公司股东可以直接、排他地行使权利转让股权，既可以转让全部股权，也可以转让部分股权，不受他人非法干涉。股权转让自由和股东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区别于其他企业组织形式的本质特征，也是公司制度的魅力所在。股权转让自由是原则，股权转让限制仅为例外。

例如，国有股的转让要经过评估挂牌交易，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特殊公司如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的股权转让需要经过报批程序。允许股权合法自由转让是保持公司组织体持续稳定和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公司法规定，股东转让股权无须取得其他股东同意，只须保障优先购买权即可，侵犯优先购买权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为了维护交易秩序和公司稳定经营，对股东优先购买权被侵害后，股东应当及时行使相关权利进行救济。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通过不断总结审判经验，提升公司纠纷案件的审判质量，实施好公司法，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